



天子南库

清前期广州制度下的中西贸易

张晓宁\著

江西高校出版社

「九五」国家重点图书
杨国桢 主编

海洋与
中国

丛书



天子南库

清前期广州制度下的中西贸易

张晓宁 著

江西高校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子南库: 清前期广州制度下的中西贸易 / 张晓宁著. —南昌: 江西高校出版社, 1999.12
(海洋与中国丛书 / 杨国桢主编)
ISBN 7-81075-006-2

I. 天… II. 张… III. 对外贸易 - 经济史 - 中国 IV
.F752.9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1999)第41081号

海 洋
与
中 国

天子南库

——清前期广州制度下的中西贸易

张晓宁 著

江西高校出版社

(江西省南昌市洪都北大道96号)

邮编: 330046 电话: (0791) 8512093 8504319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江西恒达科贸有限公司照排部照排

封面印刷: 江西新华印刷厂

内文印刷: 南昌市光华印刷厂

1999年12月第1版 1999年12月第1次印刷

850mm × 1168mm 1/32 7.875印张 145千字

印数: 1-2000册

定价: 20.80元

ISBN 7-81075-006-2/k · 001

(江西高校版图书如有印刷、装订错误, 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总 序

中国是一个兼具陆海、生态环境多样性的大国。海洋是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重要环境。现今中国的版图内,有 1.8 万余公里的海岸线,1.4 万余公里的岛岸线,沿海岛屿 6500 多个,5 大海域的海洋国土达 300 余万平方公里,相当于陆地国土的 1/3。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中华民族不屈不挠地向海洋进军,发展了自己的海洋经济、海洋社会和海洋人文模式,积淀了丰厚的文化,体现了中华文明海洋性的一面。

中华民族有光荣的海洋发展传统,也经历过从海洋退却的严重顿挫。向海洋开放,曾使中国传统的海洋产业、海洋贸易和海洋科技走在世界各国的前列;厉行海禁,压抑向海洋发展的传统,曾使中国丧失海上竞争的优势,处于落后、挨打的地位。走向海洋与忽视海洋的选择,关乎国民经济和社会文明的全局,这是我们的先辈付出沉重的历史代价换取的认识。

21 世纪将迎来海洋大发展的时代,世界各国都在调整自己的海洋发展战略,力图在新世纪抢占海上竞争的制高点。中华民族面临复兴海洋发展的机遇和挑战。贯彻、落实海洋发展的基本国策,重振海洋大国的雄风,不仅是海洋界、经济界和政府部门的事情,同时也需要人文社会科学界的积极配合。

提高全民族的海洋意识,需要发达的海洋人文社会科学。国民海洋意识的普遍薄弱,植基于历史上重陆轻海的社会价值导向和海洋人文社会科学的不发达。当代中国的海洋性研究虽在一些人文社会学科领域取得突出的进展,但尚未出现海洋政治学、海洋经济学、海洋社会学、海洋法学、海洋管理学、海洋旅游学、海洋军事学、海洋史学、海洋考古学、海洋文学、海洋民族学、海洋文化学、海洋民俗学、海洋宗教学等的全面振兴,更没有形成多元综合的学术体系。沿海地区、海洋国土和中国人从事海洋活动的外海区域,蕴藏着大量中国海洋社会人文成果和信息,有待进一步发掘和阐扬。

中国海洋人文社会科学的建设,是一项跨世纪、高难度的理论工程,需要几代学人的不懈努力。《海洋与中国》丛书有志为此做基础性的学术累积。首期出版的各册,都以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和海洋社会人文的视野,从不同的角度展示先人向海洋发展的努力、成败和荣辱,在吸收消化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挖掘民间和海上的各种中国海洋社会人文资料和信息,探索运用多学科整合的研究架构,重新审视中国海洋经济、海洋社会和海洋人文的价

值,力争有所突破,为下世纪最终达到融合创新,重塑中国海洋文明奉献一分绵力。希望这一尝试能发凡起例,得到各方面的理解、帮助和支持,唤起更多人文社会科学人士的关注和投入。同时也希望它的出版,有助于全社会更新观念,提高对中国海洋发展重要性的认识,造成关心、支持、投入海洋发展的人文氛围,迎接中国海洋经济、海洋科技和海洋社会人文大发展的 21 世纪!

楊國楨

1998 年元旦

致读者

文明古国的五千年历史长河，源远流长，构造了举世无双的中华光辉历史。“以古为镜，可知兴替”，察古思今，启迪未来。学习历史的目的在于人类的自知，我们只有对自己国家民族的历史，在新的视野下不断进行深层次的学习，才能看清今天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背景和中国国情；看清明天21世纪中华振兴腾飞的发展走向和改革大道。“如果我们不向历史学习，我们就必将被迫重演历史”，我写作本书的宗旨就在于让读者在阅读此书时，能在历史的还原回忆中深思求索，激起振兴中华民族的勇毅和决心，以崭新的面貌面向实际，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迎接多极世界新格局的挑战。泱泱中国在新世纪的腾飞，必将成为世界重要一极。

广州是中国历史上经久不衰的港市，古有“天子南库”的美誉，在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上占有独特的地位。特别是18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中叶，清廷专限广州一口对外通商，中国社会经济与世界市场的碰撞互动是在广州制度下进行的，因此，剖析广州制度下的中西贸易，也就成为认识这一特殊时期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的关键。

18世纪初至19世纪中叶是中西文明大碰撞时期，是西方国家从对华商务扩张到武力征服中国，传统中国向殖民地半殖民地转化的关键时期。18世纪中叶的清朝统治者仍以天朝大国的传统观念制定对

外关系原则，设计了“广州制度”(Canton System)或“广州通商制度”(Canton Commercial System)来应付西方的对华商务扩张和参与世界贸易网络，而西方国家尚不能只凭借武力打开中国市场，因此，大规模的中西经济、文化、政治交流在整整一百多年期间就在广州制度的框架中运行。清廷在防夷的前提下保持对外交流渠道，维护农业手工业经济基础上的封建专制统治，而西方国家则在一百多年中力图突破广州制度的限制，将商务乃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扩展到中国内地。近代以来中西交流的各种矛盾和冲突，都在广州制度下孕育其爆发的契机。对于繁荣而又落后的传统中国，18世纪的中西文明大碰撞是中国跟上世界潮流的良机，而对于生机勃勃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华扩张是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统治全世界的重要一步。鸦片战争爆发导致广州制度的彻底瓦解，标志着中国封建制度在世界资本主义扩张下的完全失败。广州制度的破产不仅改变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而且彻底改变了远东以中国为中心的传统政治、经济、文化格局，传统的东方开始受制于资本主义的西方。

广州制度下以贸易为中心的中西交流，迄今一直是中外学者关注的焦点。研究这一过程，并将其置于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的视野下，有助于我们揭示近代中国历史命运的多种选择和最终走向的历史渊源。历史常有惊人的似曾相识的重复。研究广州制度下的中西贸易关系，或许能给正在走向世界的中国人以某些启迪。

一、学术史回顾

(一) 中国学者的主要研究述评

中国学者关于广州中西贸易的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最初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清代广东对外贸易的管理和制度性运作上,即粤海关和十三行。因为广州制度主要是通过这两大组织系统构成的。关于粤海关,早在道光年间,已有梁廷楠的《粤海关志》,¹翔实地记述了清代粤海关对外通商和关税税制的有关政策法令、事例或成案,是研究鸦片战争前清朝粤海关及对外贸易方面最基本的史料。1937年出版的梁嘉彬《广东十三行考》一书,²全面、系统地考察了十三行的起源、沿革和各家行商的活动情况。梁嘉彬的最重要贡献,是将西文史料(主要以Morse的著作为主)与中文史料(以《粤海关志》和清档为主)相互印证,从而还原十三行的行名、行主及大量经营细节。因此,梁书不仅为后来研究者提供了大量经过审视、考证的有关广州十三行的史料,而且以研究十三行为对象,开始了广州制度的研究。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广州对外贸易史的研究较少被人注意,但仍然有一些学者发表了一批质量较高的文章,研究的深度较之三四十年代有所发展。彭泽益先生的《清代广东洋行制度的起源》及后来发表的《广东十三行续探》等文,³阐述了清初开海前后广东对外贸易的情况,对洋行制度的起源问题作了持之有故的考察,提出了与梁氏不同的看法,认为十三行起源于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粤海关设立的第二年。这一时期特别要提到的是严中平主编的《中

国近代史统计资料选辑》、⁴姚贤镐的《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⁵及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⁶他们大量利用和翻译西文统计资料与研究成果,为我们考察广州制度及广州贸易的规模、性质及影响等问题,提供了比较全面、科学的计量统计资料。

对广州中西贸易进行系统的、全面的研究,是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真正开始的。这一时期,广州中西贸易问题的研究范围有了新的开拓,已不限于长期为人们所注意的十三行和粤海关问题。在研究方法上,也引入了区域经济学、社会学特别是计量经济史学等现代科学方法,从新的视角,对广州中西贸易进行了多层次、多方位的探讨。归纳起来,主要围绕以下几方面的问题展开:

1. 关于广州制度的评价。自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至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清廷限定广州为中国唯一的对外通商口岸后,在对外贸易上采取了严格管理和限制的政策,西人称之为“广州制度”。对这一问题争论的焦点集中在对清代前期(鸦片战争前)对外贸易政策的评价上。黄启臣的《清代前期海外贸易的发展》、《清代前期的广州对外贸易》⁷及邓开颂《清代前期政府对广州海外贸易的若干特殊政策及其影响》、⁸张彬村《明清两朝的海外贸易政策:闭关自守?》等文,⁹认为清朝专门设立了很多海关,用以管理中国商民的海上贸易,并且使清前期的海外贸易获得不断的发展,说明清前期实行了一条开海设关的对外政策。而在戴逸《闭关政策的历史教训》一文、¹⁰朱雍《不愿打

开的中国大门》一书中，¹¹认为清王朝对通商口岸以及一些进出口商品实行限制，并对来华的外国人也做了种种苛细的限制和防范，这种政策就是闭关政策。顾卫民《广州通商制度与鸦片战争》一文，¹²从广州制度的具体运作入手，认为广州制度本身的腐败和落伍所引起的日益频繁的中外磨擦与鸦片战争的起因有必然的联系。

关于长期为人们所注意的粤海关和十三行问题，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学者们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戴和《清代粤海关税收述论》、《论清代前期粤海关的用人》、《试论清前期粤海关征税用人的弊端》等文，¹³运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的大量清代档案，对1685~1800年间粤海关监督的简充、家人、书役的签派，粤海关税收的定额、考核和收支报解等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认为清代开海设关，对中外贸易的发展有利，但粤海关的腐败又使清代中外贸易的正常发展受到严重破坏。此外，台湾学者陈国栋从粤海关的行政体系、税务行政及利益分配等角度，对粤海关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研究，如：《粤海关的行政体系，1684~1842年》、《清代前期粤海关的税务行政，1684~1842年》和《清代前期粤海关的利益分配，1684~1842年》等文，¹⁴利用大量中西文资料，进行了较系统的具有启发性的论述。

2. 关于广州中西贸易规模、状态、性质及商品结构等问题的研究。持开放论的学者从商船、商品等进出口数量及贸易额的增长等方面，对广州中西贸易的状况进行了分析，认为清代前期广州的中西贸易获得了空前的、不断的发展，并呈现出一派繁荣的

景象。¹⁵而持闭关论的学者则认为清代前期广州中西贸易的发展,主要是依靠西方商船来华的被动贸易来实现的。相反,中国海商出海的主动贸易却在逐渐衰落,也就是说,这一时期中国商民和清廷在整个海外贸易中所占的份量逐渐减少。因此,广州中西贸易的增长,与其说标志着清朝海外贸易的繁荣,莫如说它逐渐陷入危机。正是通过这种具体内容的海外贸易的发展,中国物质财富开始大量流向英国等西方国家。¹⁶

庄国土的《茶叶贸易和18世纪的中西商务关系》(英文版)一书,以计量统计方法,系统引用西方近20年来的资料和研究成果以及大量的清朝档案资料,探讨了广州制度的运作及18世纪的中西茶叶贸易及中西商务关系。¹⁷

杨国桢、黄福才的《道光前期中西贸易的变化及其影响》一文,¹⁸从贸易关系、商品结构、贸易及交换方式等方面探讨了道光前期中西贸易关系所发生的重要转变及其对中国社会经济所产生的深刻影响。

与广州贸易有关的专门史的研究,有叶显恩主编的《广东航运史》(古代部分)、¹⁹邓端本主编的《广州港史》等专著,²⁰他们分别从水运史、港史的角度,为我们研究广州贸易提供了渊源关系和历史面貌。

港台学者在有关中西贸易的相关研究中,特别要提到的是全汉升先生的研究成果。他的《明清间美洲白银的输入中国》、²¹《美洲白银与十八世纪中国物价革命的关系》等文,²²考察了明清时期美洲白银经菲律宾流入中国的情形,并认为,由于白银大量流入中国造成中国货币流通的数量激增,从而引发了

18 世纪中国的物价革命。《明清间中国丝绸的输出贸易及其影响》²³ 及《自明季至清中叶西属美洲的中国丝货贸易》等文,²⁴ 引用大量中西文资料, 分析了中国丝货向美洲输出的背景、丝货贸易的具体情况 & 中国丝货对美洲的影响等问题。此外, 其《略论十七八世纪的中荷贸易》、²⁵《再论十七八世纪的中荷贸易》等文,²⁶ 为我们研究明清中西贸易提供了有益的启示。陈慈玉的《以中印英三角贸易为基轴探讨十九世纪中国的对外贸易》一文,²⁷ 以中国与英国及其殖民地印度之贸易为基轴, 探讨了 19 世纪中叶以后至 20 世纪为止的中国对外贸易之结构与特质。林满红的《中国的白银外流与世界金银减产(1814~1850 年)》²⁸ 一文主要探讨了 19 世纪上半叶世界性经济萧条与中国的关联。有关历史时期世界性的经济景气与萧条如何影响西方社会的问题, 西方学者早已有所注意。但是尚无学者探讨过 19 世纪中国与世界经济起伏的关系。林文广泛引用中西文献及相关研究成果, 指出此一关联, 见解独到。她指出: 由于世界经济萧条, 刺激鸦片商人在其他获利机会减少的情况之下更加铤而走险, 把鸦片走私到中国。世界经济萧条也使中国丝茶出口较不活络, 以致无法平衡鸦片进口所支出的白银而造成白银外流。林文因此指出, 在一般所熟知的鸦片进口之外, 世界经济萧条实为 19 世纪上半叶中国白银外流更深一层的理由。

总之, 港台学者的研究特点在于对西方资料的广泛应用及大量采用计量统计方法, 这一特点及其观察问题的角度, 得出的许多具体结论, 对我们研究广州制度下的中西贸易, 都具有富于启发性的借鉴

作用。

(二)外国学者的主要著述及资料评述

西方学者对清代中外贸易关系的研究，影响最大的是曾在中国海关担任过税务司的美国人马士(H. B. Morse)。他所著的五卷本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1635~1834 年)(《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 1635~1834 年》)一书，²⁹ 是其卷帙最丰的一部巨著。其特点是根据英国东印度公司档案及西方有关中国早期著作的资料按年编成，是一部资料价值很高的著作。本书涉及该时期中国与英国等西方国家的关系、早期中西贸易、清代前期海关行政、广东十三行的历史，为研究广州制度时期的中西贸易提供了极有参考价值的资料。

普里查德(Earl. H. Pritchard)的 *The Crucial Years of Early Anglo-Chinese Relation, 1750~1800*(《早期中英关系的决定性年代, 1750~1800 年》)一书，³⁰ 是继马士之后系统研究 18 世纪中英贸易的杰作。其特点是统计资料翔实。其资料除利用东印度公司贸易档案外，还利用国会档案、殖民地档案等。如果说马士的著作是一部资料性著作，则普里查德的著作是一部研究性著作。

格林堡(Michael Greenberg)的 *British Trade and the Opening of China, 1800~1842 年*(《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 1800~1842 年》)一书，³¹ 实际上是继续了普里查德的研究，将中英贸易研究扩展到鸦片战争爆发。如果说马士、普里查德集中研究了东印度公司的贸易，格林堡的研究价值则在于论述了英国散商的对华贸易，而英国散商是广州制度最后 20 年

的最重要外商。

集广州贸易研究之大成的是法国学者德尔米格尼(Louis Dermigny)。他在1964年出版了三卷本 *La China et L'Occident. Le Commerce a Canton au XVIIIe Siecle, 1732~1833年* (《1732~1833年广州与西方的贸易》) 一书。³² 此书资料翔实、内容丰富, 系统利用英、美、法、普、瑞、丹、荷等国对华贸易的档案资料与研究成果, 对广州贸易的运作、商品、价值、利润、航运等作了详细的量化统计, 附有数百种统计表格。迄今尚未有一部全面论述广州对外贸易的著作能与之相比。

英国华人学者张荣洋(W·E·Cheong), 在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先后发表了多种关于广州贸易的系列论文和专著。³³ 他将广州贸易与同时期其他贸易港的发展相比较而论证其结构、地位与趋势, 其研究方法 with 结论亦颇有见地。

此外, 美国、荷兰、瑞典、丹麦等国均有一批研究这一时期广州贸易的学者, 也取得相当成绩(他们的研究成果本书将在相关章节中加以论述)。总之, 西方学者对广州贸易研究的普遍特点是: 利用贸易档案, 以计量统计方法研究广州贸易及其制度, 在贸易额、商品、航运、价格、利润等方面取得了令人信服的成果; 其次, 注意比较研究方法, 在论证广州制度时, 以当时其他贸易港及其他贸易地区作为参照, 或从其相互联系中考察其地位和发展趋势, 而这方面是中国学者所缺乏的。

二、思考的学术角度

广州中西贸易曾经是，今天仍然是中外学者关注的焦点之一。研究这一历史过程，不仅能揭示中国历史命运的丰富内涵，而且能对走向世界的中国人有深刻的启示。

恕作者孤陋寡闻，在学术回顾中只不过撷取广大学者的真知灼见十一于千百。但必须指出的是，在迄今为止的广州中西贸易研究中，意识到这种贸易是16世纪开始的西方资本主义扩张力与中国商品经济发展的外张力发生碰撞、产生互动作用的结果的论述还不多见。站在世界近代经济发展的角度，把广州中西贸易作为中国海洋社会经济逻辑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来予以探究讨论的就更少了。于是，在以往有关的研究和讨论争鸣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么两种现象：

其一，对清前期广州中西贸易在中国社会经济中的地位基本上予以否认，认为清王朝采取的政策始终是闭关锁国的政策，海禁时期是闭关，开禁之后对中外海商的种种限制仍然是闭关；四口贸易并非开放，四口改为一口更是锁国。根据这种观点作出的判断，就是明清时期中国基本上没有海外贸易，因此，中国也就没有参与16世纪到19世纪前期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竞争，中国因此落后了。这种研究的过程，基本上是以清朝的官方海禁文件为资料，以中国只是内陆农业大国的既定观念为前提的。它忽略了中国社会的多元特征，中国同样也是一个海洋大国；忽略了自古以来就一直存在着的海洋社会经济；忽

略了自明中叶以后，中国的海洋社会经济在内在张力和外来拉力的互动作用中已进入了转型发展期；至少它忽略了以民间贸易为主体的中外海上贸易的史实，忽略了茶丝的出口与白银的输入以及鸦片对中国社会经济产生的种种影响的史实；它认为中国的大门一直是紧闭的，直到1842年被外国人的大炮轰开。

其二，对清前期广州中西贸易在中国社会经济中的地位过于褒奖夸扬，认为清王朝采取的对外政策是比较开放的，不存在闭关锁国的问题，大量的茶丝等中国商品输向欧美市场，数亿元白银以平均每年一百余万元的数量涌进广州。而清前期的海禁不仅是短期的，也是有策略性的，乾隆朝改四口为一口贸易是一种合乎当时中国国情的行为，有海防与防止资本主义势力对中国存有扩张的侵略野心的必要，拒绝英国提出的种种要求，是一个主权国家应有的态度。显然，在这一研究过程中，存在着一个观察的视角问题，即只是站在广州一口贸易制度上看待广州的中西贸易，为广州的中西贸易繁荣叫好，却没有认识到广州制度本身具有的局限性及它的建立是以牺牲全面贸易的机会，牺牲中国私商发展机遇为代价的，没有认识到清王朝建立广州制度的动机是消极保守的，没有严格区分消极保守的广州制度本身与中国海洋社会经济仅一口贸易艰难地发展，并以此突破了广州制度这两个性质不同的问题，更没有站在世界海洋社会经济发展的高度去品评广州制度对中国海洋社会经济的约束与扭曲。

针对上述问题，我们可以着重思考以下几点：